

农村户籍儿童的出生顺序与非认知能力 ——基于亲子互动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 蒋亚丽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 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4-2015学年追访数据,分析农村儿童出生顺序对其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农村户籍儿童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有三条作用路径。直接效应:不同出生顺序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并无显著差异。亲子交流中介效应:出生顺序越靠前的农村儿童与父母情感交流的频率越高,表现出的在校社交非认知能力越强。亲子活动中介效应:出生顺序越靠后的子女,与父母共度的亲子活动时间越少,在校社交非认知能力越弱。研究结论再次印证了资源约束假说和次序歧视理论在农村家庭的适用性。即使在文化资本贫乏的农村家庭,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依然能够显著影响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为了提升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可以实施政策干预,通过家庭外帮扶增强农村儿童的机会获得,以达到能力培养的公平。

【关键词】 农村户籍儿童 出生顺序 非认知能力 亲子交流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2.018

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始于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主要关注在儿童身上的经济投资如何影响教育获得,乃至今后职场上的薪资回报^[1]。与认知能力的研究相比,非认知能力的探讨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地位。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为首的新人力资本理论支持者,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和非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两部分^[2],开始了把对个人成就的探讨转换到个人能力的视角上来的研究进程。所谓非认知能力,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3]。具体指与个人人格特质、个性特征等相关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和行为等^[4-6]。

进入20世纪,学术界把与经济发展和个人成就密切相关的研究议题从认知能力转移到了非认知能力领域^[7]。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除了智力因素,社交能力、恒心、毅力等非认知能力因素与个人受教育程度、职业和健康等密切相关^[8-9]。非认知能力水平不仅预示着一个人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获得事业成就,在劳动市场上获得高薪资回报的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在职场上避免失败、面对逆境时触底反弹的本领^[10]。农村户籍儿童大多在复制父辈的社会阶层,他们像父辈一样从事着低技术含量和非管理类工作,很难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11]。对底层技术工人就业影响效果更为显著的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在失业时

收稿日期:2022-01-11

作者简介:蒋亚丽,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青少年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移动互联网对西南地区农村幼儿家庭教育模式的干预路径研究”(课题编号:KJQN2018009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快速重新就业的意义尤为突出。相较于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更具有延展性,也更便于后期进行政策干预^[12]。

非认知能力被认为与家庭环境和父母在儿童时期不同阶段的家庭投资密切相关^[13]。研究发现^[14-15],最为有效的家庭投资是培养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较高的非认知能力能够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进而带来智力的良好发育和未来学业的成功,反之则不成立。家庭环境不仅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包括兄弟姐妹数量、出生顺序等因素。父母对子女的家庭投资除了物质投资外,还包括对子女的关注、照顾、亲子交流等非物质类投资。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则是培养其非认知能力的主要途径。和谐的亲子活动是培养儿童良好个性的教育之道^[16],良好的亲子关系还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缺失带来的心理劣势^[17-18]。农村儿童因父母外出打工或教育意识缺失等原因,亲子互动频率普遍在较低水平徘徊,甚至出现了“疏离型”亲子互动模式^[19],进而导致儿童心理健康^[20]和语言发育^[21]出现问题。由此可见,农村家庭的亲子互动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

关于出生顺序对个人成长的研究比较著名的解释理论有两种:一种是资源约束假说,该理论认为出生越早的孩子面临家庭资源的约束越少,相反,出生越晚的子女由于存在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获得的父母资源越少^[22]。这种现象又被称为“次序歧视”。罗凯、周黎安^[23]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在受教育程度上,出生顺序越靠后的孩子,受教育程度越高。为了进一步说明家庭资源的作用机制,与之相近的资源稀释假说把家庭资源分为间接影响教育成就的家庭资源(如亲子互动)和直接影响教育获得的资源(如家庭经济能力)^[24-25]。另一种是交流互动论,该理论认为兄弟姐妹之间无论是交流、冲突、游戏,还是竞争,均能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也能促进学业提升^[26-28]。

国外学术界把出生顺序作为重要变量对家庭资源分配进行考察,试图寻找出生顺序和非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逻辑联系。国内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出生顺序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上,涉及非认知能力的研究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放开,更多的农村家庭选择养育更多的子女。考察出生顺序与亲子互动^①、非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家庭资本比较薄弱的农村子女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更多的是资源约束作用,还是交流支持作用,出生顺序如何影响农村儿童家庭内部的亲子互动资源分配,亲子互动频率又能否影响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形成,这些都是本文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梳理及研究假设

(一)出生顺序与非认知能力

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因素在个人性格特征塑造上扮演重要角色^[29-30]。出生在同一家庭的兄弟姐妹在智力和个性特征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31],通过对非认知能力的进一步测算发现,兄弟姐妹间非认知能力的相关性高达45%^[32-33]。不同出生顺序的子女在竞争家庭资源时会采用不同的策略,从而造就不同的非认知能力。早在1927年,心理学家就发现家庭中同胞个性的差异与出生顺序相关,最早出生的孩子更富有权威^[34]。生长在同一家庭中子女的非认知能力随着出生顺序的增加而降低^[35]。家庭中第一个孩子从事高级管理职位的比例最大,而高级管理职位相应的要求也更高,包括社交能力在内的非认知能力。另外的研究^[36]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第一个孩子更具责任心,而后出生的孩子则更具创新性,也会变得容易相处,

① 亲子互动作为一个复合概念,具体操作化为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

社交能力较强,进而非认知能力较强。进化心理学也认为,后出生的子女为了努力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会变得更加乖巧随和、容易相处以获得父母更多的资源^[37]。

根据以上内容,提出第一组竞争性假设。

假设 1a: 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出生顺序越靠后,非认知能力越强。

假设 1b: 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出生顺序越靠后,非认知能力越弱。

(二) 出生顺序、亲子交流与非认知能力

亲子互动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科尔曼^[38]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闭合理论将父母对子女成长过程的参与分为家庭外部参与和家庭内部参与^[39]。其中家庭内部参与就包括了父母与孩子交流以及带子女参加文化活动等内容,这些维度被国内学者所接受,具体操作化为“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两个维度^[40-41]。

出生后的第一年被认为是儿童技能形成的关键期^[42]。最先出生的孩子作为父母第一个子女得到了全部的关爱。随着后面子女的到来,父母的精力被分散,包括父母陪伴和关注在内的家庭资源也开始变得稀缺^[43]。尽管如此,在家庭资源受到约束的情况下,父母仍然会对第一个出生的子女另眼相待^[44-45]。出生在同一家庭中的子女竞争是常态,在幼年时期,他们会为了得到母亲更多的关爱使尽浑身解数^[46],进而造成不同出生顺序子女的行为和父母的投资多寡也不相同。西方学者研究发现,越晚出生的子女,父母与他们交流学校生活的的时间越少,他们的非认知能力也越低^[47]。

我国有学者研究发现,家庭亲子互动情况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来自农村家庭或低阶层家庭的儿童与父亲的关系亲密度较低,显著阻碍了其学业发展^[48]。另一项关于所有儿童家长参与的研究表明^[49],虽然有些父母无力参与子女的学习过程,但他们的情感支持,如高质量的亲子交流,则可以提升孩子在校的竞争力。在双子女家庭中,排行“老二”的孩子得到父母的亲子沟通、家校沟通以及共同活动教育卷入水平最高^[50]。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假设 2: 出生顺序通过亲子交流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挥着间接影响作用。出生顺序越靠前,亲子交流越频繁,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

(三) 出生顺序、亲子活动与非认知能力

父母积极构建亲子活动能够提升子女的自我效能感^[51],促进子女在学校适应能力的提升,进而提高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水平。亲子活动亦能通过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提升子女的学业成绩^[52]。基于 100 余位留守儿童的教育实践也发现,和谐的亲子活动能够有效培养孩子良好个性的发展^[53]。除此以外,亲子活动还能够显著影响大学生在校的情感投入以及与老师和同学的互动^[54],能有效促使子女加大在校的学习投入^[55]。

另外,一项基于 0-8 岁儿童图书馆亲子阅读活动的研究显示,亲子活动不仅能促进儿童能力提升^[56],还能促使亲子交流增加、亲子情感加深和儿童发展的进一步提升^[57]。自然博物馆亲子教育活动的实践也显示,物理场馆的亲子活动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使父母更好地了解子女^[58]。随着城市中亲子活动的开展,农村家庭的家长也意识到了亲子活动对子女发展的重要性,并自发地加以实施^[59]。

综合以上内容,提出本文的第 3 个假设。

假设 3: 出生顺序通过亲子活动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挥着间接影响作用。出生顺序越靠前,亲子活动越频繁,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

二、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简称为 CEPS)2014 - 2015 学年追访数据。该数据在抽样时选择大量农村户籍儿童入样,是研究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问题比较理想的数据资源。依据农村户籍儿童的概念及特性,按照“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筛选样本,并排除独生子女家庭,得到研究数据。追访数据只有原来就读七年级,追访时就读八年级的学生样本。最终得到农村户籍非独生子女,且家中兄弟姐妹数量少于4个的学生样本共3669份^①。

(二)变量

1. 因变量

非认知能力总体来说指人们的个性特征^[60],它包含很多维度。外文文献中,与人们个性和性格特征相关的特质都被称为非认知能力,如社交能力、自我效能感、毅力等。由此可见,非认知能力是个综合概念。纵观国内外关于非认知能力的相关研究,均采用人格特征的某一方面指代非认知能力^[61-64]。因此,本文以社交能力指代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

非认知能力作为潜变量,题目来自于学生问卷 B6 部分的 4 个问题:“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所在的班级班风良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的活动”“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答案选项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潜变量非认知能力以及下面的亲子交流、亲子活动的观察变量均通过了结构方程模型对题目的信度分析。后面不再赘述。

2. 中介变量

亲子互动是本文的中介变量,它包含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两个潜变量。研究发现,在能力的代际传递过程中,母亲相较于父亲通过较多的子女抚养行为对子女的能力培养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65]。因此,亲子互动变量在同时涉及父亲和母亲的情况下,只选择母亲变量进行分析。亲子交流潜变量的观察变量题目是学生问卷 A21 题,即你母亲是否经常与你讨论以下问题:“学校发生的事情”“你与同学的关系”“你与老师的关系”“你的心事或烦恼?”选项设置为“从不”“偶尔”“经常”。亲子活动潜变量的观察变量题目在学生问卷 A 部分 24 - 26 题,包括:“你和父母一起吃晚饭;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外出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等的频率大概是?”选项设置为“从不、每年一次、每半年一次、每个月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一次以上”。

3. 自变量

核心自变量为出生顺序,结果按照被访者的填答进行了重新编码:姐姐数量与哥哥数量之和再加 1 为被访者的出生顺序。

(三)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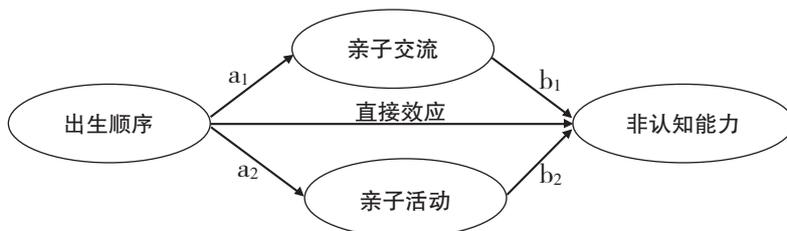


图 1 概念模型图

^① 数据结果显示,拥有 1 个兄弟姐妹的农村儿童的数量为 4085 人,占有所有农村子女的 77.9%;拥有 2 个兄弟姐妹的为 956 人,占比 17.1%;拥有 3 个兄弟姐妹的为 200 人,占比 1.9%;拥有 4 个及以上兄弟姐妹的占比 1.4%。因此本文保留兄弟姐妹数量为 3 个及以下的农村儿童进行分析。

由于本研究涉及到亲子交流、亲子活动两个中介变量,因此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概念模型见图1。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共有三条路径:一是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的直接影响;二是出生顺序经由亲子交流中介效应的间接影响;三是出生顺序经由亲子活动中介效应的间接影响。分析软件采用Amos24.0版本。

由于中介效应乘积项通常不满足传统中介效应检验所要求的正态分布,因此采用更为强大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与比较分析^[66-67]。样本抽取放回次数设定为2000,估计方法为最大化似然法,并用MLM法对模型进行修正。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相关变量的信效度检验

表1 信度与收敛效度

构面	题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组成信度 CR	收敛效度 AVE
		STD	S.E.	Z	P-Value		
亲子交流	讨论学校	0.791	0.012	65.926	***	0.855	0.597
	讨论同学	0.813	0.014	57.915	***		
	讨论老师	0.777	0.013	55.512	***		
	讨论心事	0.705	0.014	50.004	***		
亲子活动	一起吃饭	0.809	0.013	62.231	***	0.659	0.434
	参观场馆	0.771	0.027	28.673	***		
	参加活动	0.232	0.017	14.328	***		
非认知能力	同学友好	0.674	0.018	37.444	***	0.774	0.462
	班风良好	0.697	0.018	38.377	***		
	参与活动	0.620	0.017	35.377	***		
	对人亲近	0.723	0.016	45.188	***		

注:***代表 $p < 0.001$ 。

由表1所示,亲子交流、亲子活动、非认知能力三个潜变量维度及其所有题目,标准化因子载荷量大体在0.620-0.813之间,根据P值所示,所有题目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组成信度(内部一致性)基本大于0.7,收敛效度在0.434以上,均在可接受范围。

表2 信度、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分析

构面	组成信度	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		
	CR	AVE	亲子交流	亲子活动	非认知能力
亲子交流	0.855	0.597	0.772		
亲子活动	0.659	0.434	0.512	0.659	
非认知能力	0.774	0.462	0.769	0.528	0.680

注:对角线粗体字为AVE开根号值,下三角为维度之皮尔逊相关。

根据福内尔和拉克尔(Fornel&Larcker)^[68]的建议,区别效度部分的对角线放上AVE开根号值,下三角为三个变量相互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由表2可见,两个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有

着显著的相关性。比较结果发现,AVE开根号值全部大于同行和同列的其他相关变量,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二)结构方程模型指标及结果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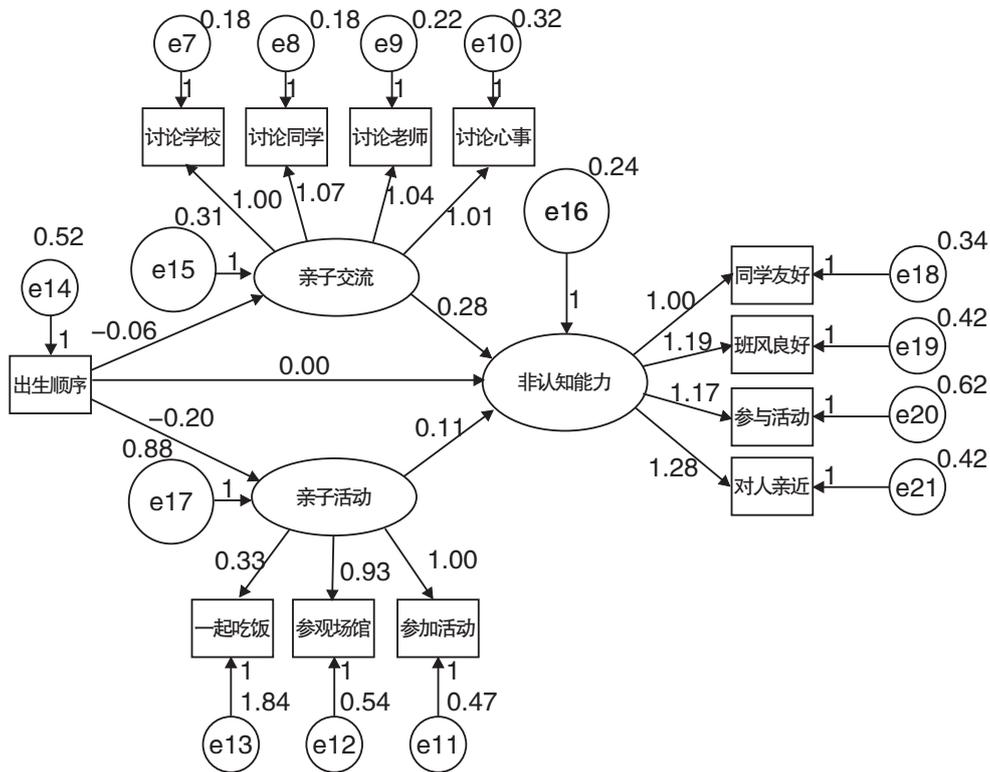


图2 结构方程模型^①

由图2可知,出生顺序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的两条间接效应均在 $p<0.001$ 范围内显著。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的直接效应的非标准化系数接近于0,且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表明出生顺序对农村儿童的非认知能力没有直接显著影响。因此“假设1a: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出生顺序越靠后,非认知能力越强”和“假设1b:出生顺序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直接影响。出生顺序越靠后,非认知能力越弱”没有通过验证。出生顺序对亲子交流潜变量影响的系数为负,表明出生顺序越靠后的农村儿童与母亲的交流越少。亲子交流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与母亲交流越多,农村儿童在学校融入时表现出的非认知方面的社交能力越强。总的来说,出生顺序越靠后的农村儿童,在家庭内部得到父母的情感关注越少,在家庭外部的学校表现出的主观社交意愿和行为能力也越差。亲子活动潜变量涉及到与父母一起吃饭,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一起看电影、演出和体育比赛等行为。结果发现,越晚出生的孩子,与父母一起从事亲子活动的概率也越低,其在校所表现出的非认知能力也越弱。

值得一提的是,由表2区别效度部分的变量间皮尔逊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亲子活动与亲子交流呈正向相关关系,亲子活动越多的家庭,亲子交流也越频繁。愿意花费时间关注子女在校

^① 图中数据为非标准化系数。出生顺序对非认知能力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其余所有路径和间接效应均在 $p<0.001$ 水平上显著。模型各项拟合度指标为 $MLX^2 = 291.998$, $Df = 49$, $X^2/df = 5.959$, $CFI = 0.986$, $TLI = 0.982$, $RMSEA = 0.031$, $SRMR = 0.026$ 。各项拟合指数基本满足结构方程模型的指数要求。

人际关系和子女成长烦恼的家长,一般对子女的整体关注度较高,会用心培养子女并陪伴他们的成长,也会有意识地带子女去一些文化场馆开阔他们的眼界。总的来看,家里年纪越小的孩子,与父母一起吃饭,一起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一起看电影、演出、体育比赛的概率越低,与父母情感交流的机会也越少。当活动场域从家庭扩展到学校后,这部分农村儿童表现出来的非认知社交能力也越低。

(三)多重中介效果的对比分析

表3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比较

	点估计值	系数			Bootstrap1000次的95%置信区间			
		S.E.	Est./S.E.	P-Value	偏差校正估计		百分位估计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直接效应								
出生顺序	-0.147	1.166	-0.126	0.969	-0.053	0.003	-0.051	0.004
特定间接效应								
亲子交流(ab1)	0.268	0.045	5.956	***	-0.037	-0.017	-0.037	-0.017
亲子活动(ab2)	0.089	0.127	0.700	***	-0.041	-0.025	-0.041	-0.025
总间接效应	0.357	0.073	4.890	***	0.047	0.069	0.052	0.077
两条路径对比								
亲子交流 VS. 亲子活动	0.260	0.052	5.001	***	0.007	0.015	0.008	0.018

注:***代表 $p < 0.001$,表中系数均为非标准化系数。

本研究设定了两个中介效果,一条是出生顺序→亲子交流→非认知能力,另一条是出生顺序→亲子活动→非认知能力。由表3可以看出,基于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的中介效应都得到了数据的有效支持,总间接效应也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中介效应的路径分解:出生顺序与亲子交流的因果关系 a_1 ,亲子交流对农村户籍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的效应 b_1 ,出生顺序与亲子活动的因果效应 a_2 ,以及亲子活动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效应 b_2 ,都在 $p <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至此,“假设2:出生顺序通过亲子交流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挥着间接影响作用。出生顺序越靠前,亲子交流越频繁,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和“假设3:出生顺序通过亲子活动对农村户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发挥着间接影响作用。出生顺序越靠前,亲子活动越频繁,儿童的非认知能力越强”均通过了验证。

特定间接效应被定义为因变量Y经由中介变量i对自变量x两个过程的非标准化系数的乘积。经由亲子交流中介效应的特定间接效应为 $ab_1 = a_1 * b_1$ 。同理,经由亲子活动中介效应的特定间接效应为 $ab_2 = a_2 * b_2$ 。比较两个中介效应的差异,生成新的变量 $diff = ab_1 - ab_2$,即为表3中两条路径对比部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ab_1 和 ab_2 两条路径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亲子交流中介效应的非标准化参数是0.268,表示亲子交流变量使出生顺序与非认知能力二者直线的斜率增加了0.268个单位。同理,亲子活动变量使直线斜率增加了0.089个单位。由此可见,亲子交流变量的中介效应大于亲子活动的中介效应。

以上是对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两个中介变量间接效应的比较分析。关于文化场馆(图书馆、博物馆)亲子活动的研究发现,文化场馆的亲子活动在提升儿童能力发展的同时,还能增进亲子交流,促进亲子感情的提升^[69-71]。基于此,把亲子交流做因变量,亲子活动做自变量,做简单回归,探究二者之间的因果链条是否成立。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亲子活动对亲子交流的影响在 $p < 0.001$ 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回归系数为0.288,调整 R^2 为8.3%。由此可见,家庭内

外的亲子活动可以使父母从多维度观察和了解子女,共同的活动也为亲子交流提供了话题,增进了彼此间的感情。这又进一步促使子女把父母当作朋友,愿意把学校的见闻趣事、人际关系、烦恼等与父母分享。可见,亲子活动在子女的非认知能力培养方面发挥着双重作用。

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追访数据,研究出生顺序、亲子互动与农村户籍儿童非认知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国内外研究惯例,非认知能力采用的是社交能力这一细分维度,亲子互动则包含亲子交流、亲子活动两个变量。

研究发现,出生顺序不能直接影响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即出生顺序对子女以社交能力为代表的非认知能力并无显著作用。经由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两条中介效应的间接影响效果均具有在 $p < 0.001$ 水平上的显著性。这说明出生顺序主要通过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的中介作用机制,对农村儿童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出生顺序与亲子交流潜变量是负向因果关系。出生越早的子女,与父母的亲子交流越多,在学校也表现出容易亲近,更愿意参与学校活动的一面。另外,出生较晚的孩子,在遭受母亲情感忽视的情况下,也极少能享受到与父母一起参观文化场馆或者外出就餐这样的休闲时光。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学者的论断,即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会被另眼相待^[72],也会分配到家庭中更多情感资源^[73-74]。这为该结论的跨文化普适性提供了新的证据。本研究结论也再次印证了资源约束假说和次序歧视在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适用性,出生顺序甚至可能成为约束农村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深受家庭环境制约的非认知能力,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更为重要。它不仅影响着其学业成绩和最终的教育获得,还预示整个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就、面对失败及触底反弹的能力。对于农村儿童的教育帮扶,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公平进程,通过教学设施和师资的配备,增加其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学业之外的非认知能力的教育,通过另一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增加其生命历程的厚度。总的来看,亲子交流带给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大于亲子活动,即子女更需要父母情感上的深度陪伴。家中出生较晚的孩子更需要加强父母的关爱,在农村家庭中要加强养育孩子的亲职教育。

[参 考 文 献]

- [1][2][61] James J. Heckman, Yona Rubinstein. The Importance of Noncognitive Skills: Lessons from the GED Testing Progra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2).
- [3][60] Mood, Carina, Jan O. Jonsson, and Erik Bihagen. Socioeconomic Persistence across Generation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Processes. In John Ermisch, Markus Jantti, and Timothy M. Smeeding (ed.),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dvanta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12, pp.53-83.
- [4][9][10] Lindqvist, E., Vestman, R. The Labor Market Returns to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Swedish Enli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1, (3).
- [5] 盛卫燕 胡秋阳:《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与技能溢价——基于CFPS 2010-2016年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载《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 [6][63] 黄超:《家长教养方式的阶层差异及其对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载《社会》,2018年第6期。
- [7] Duckworth Angela L., Abigail Quirk, Robert Gallop, Rick H. Hoyle, Dennis R. Kelly, and Michael D. Matthews,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Predictors of Success*,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2019, (47).
- [8] Almlund, M., Duckworth, A.L., Heckman, J.J., Kautz, T.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E.A.Hanushek, S.Machin, & L.Woessmann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2011, pp.76-84.
- [11] 蒋亚丽:《父母期望、学校类型与流动儿童学习成绩》,载《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

- [12][65] Erik Gronqvist, Erik Lindqvist. The Making of a Manager: Evidence from Military Officer Training,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 (1).
- [13][72] Cunha, Flavio, James J. Heckman. The Technology of Skill 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
- [14] Cunha, F., Heckman, J.J., Schennach, S.M..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Econometrica*, *Econometric Society*, 2010, (3).
- [15] Borghans, L., Meijers, H., Weel, B.T.. The Role of Noncognitive Skills in Explaining Cognitive Test Scores, *Economic Inquiry*, 2008, (1).
- [16] 江西省教育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组:《和谐的亲子活动是培养留守儿童良好个性的教育之道——对100余位留守儿童两年教育的实验研究报告》,载《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 [17] 杨慧琼 李 萌:《媒介使用的亲子交流和父母介入:一项小学生的家庭媒介教育研究》,载《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 [18] 赵春梅:《窗边的孩子:青少年电子游戏成瘾的家庭因素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56页。
- [19] 沈玉萍:《流动家庭亲子互动理论构建研究》,载《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1年第17期。
- [20] 李潇晓 刘 越 等:《留守初中生亲子互动与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载《中国学校卫生》,2021年第6期。
- [21] 段小倩 等:《亲子互动对0—3岁留守儿童语言发育的影响》,载《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20年第5期。
- [22] 陶东杰 王军鹏 张克中:《家庭规模、资源约束与子女教育分布——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 [23] 罗 凯 周黎安:《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差异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一个基于家庭经济学视角的分析》,载《经济科学》,2010年第3期。
- [24] 叶 华 吴晓刚:《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载《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5期。
- [25] Downey, D. B., T. von Hippel Paul, B. A. Broh. Are Schools the Great Equalizer? Cognitive Inequality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and the School Yea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4, (5).
- [26] Cutting A L, Dunn J.. Conversations with Siblings and with Friends: Links betwee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6, (1).
- [27] Perner J, Ruffman T, Leekam S R.. Theory of Mind is Contagious: You Catch It from Your Sibs, *Child Development*, 1994, (4).
- [28] 聂景春 庞晓鹏 等:《农村儿童兄弟姐妹的影响研究:交流互动或资源稀释?》,载《人口学刊》,2016年第6期。
- [29] Plomin, Robert, Denise Daniels. Why Are Children in the Same Family 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Behavioral Brain Science*, 1987, (10).
- [30] Grönqvist E., Öckert B., Vlachos J..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16, (4).
- [31] Black, Sandra E., Paul J. Devereux. Recent Development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David Card and Orley C. Ashenfelter (ed.),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2011, pp.973-989.
- [32] Björklund, Anders, Markus Jäntti. How Important Is Family Background for Labor - Economic Outcomes? *Labour Economics*, 2012, (4).
- [33] Anger, Silke, and Daniel D. Schnitzlein. Cognitive Skills, Non - Cognitive Skills, and Family Background: Evidence from Sibling Correlations, Discussion Paper 9918, Bonn, Germany: IZA, 2016, pp.297-312.
- [34] Adler, Alfred: *Menschenkenntnis*, Leipzig: Fischer, 1927, pp.321-334.
- [35] Black, Sandra E., Erik Grönqvist, Björn Öckert. Born to Lead? The Effect of Birth Order on Non - Cognitive Abilit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8, (2).
- [36][37] Sulloway. *Born to Rebel: Birth Order Family Dynamics, and Creative Lives*, New York: Pantheon, 1996, pp.1321-1357.
- [38]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Supplement).
- [39] 李 波:《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的视角》,载《教育与经济》,2018年第3期。
- [40] 吴艺方 韩秀华 等:《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行为理论模型的建构与验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 [41] 李晓晗 郑 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父母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CEPS数据的研究》,载《教育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
- [42] Zajonc, Robert B. Family Configuration and Intelligence, *Science*, 1976, (192).

- [43] Price, Joseph. Parent – Child Quality Time: Does Birth Order Matter?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8, (43).
- [44][73] Becker, Gary S., Nigel Tomes. Child Endowments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6, (4).
- [45][74] Yi, Junjian, James J. Heckman, Junsen Zhang, Gabriella Conti. Early Health Shocks, Intra – 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hild Outcomes,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
- [46] Dunn, Judy, Penny Munn. Development of Justification in Disputes with Mother and Sibl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87, (7).
- [47] Black, Sandra E., Paul J. Devereux, Kjell G. Salvanes. Older and Wiser? Birth Order and IQ of Young Men,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11a, (1).
- [48] 朱安新 曹蕊:《当前中国家庭的亲子关系:城乡和阶层差异模式》,载《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 [49] 黄小瑞 安桂清:《家长参与类型与儿童学习结果的关系》,载《学前教育研究》,2018年第11期。
- [50] 郭筱琳 罗良:《独生子女父母与不同出生顺序的非独生子女父母教育卷入的比较分析——以山东省聊城市小学生家长为例》,载《教育科学研究》,2019年第5期。
- [51] 韩仁生 王晓琳:《家长参与与小学生学习自我效能的关系研究》,载《心理科学》,2009年第2期。
- [52] Oluwatelure T A. Effects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on Students Attitude and Performance in Science, *African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Research*, 2010, (1).
- [53] 彭建兰 段小倩等:《和谐的亲子活动是培养留守儿童良好个性的教育之道——对100余位留守儿童两年教育的实验研究报告》,载《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 [54] 吕素珍 黄修文:《地方综合性大学学生家庭文化资本对其学习投入的影响研究——以J大学为例》,载《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 [55] 许怀雪 秦玉友等:《家庭文化资本对初一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基于学习投入的中介作用分析》,载《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4期。
- [56][69] 潘卫芳:《图书馆亲子阅读活动对儿童早期阅读能力的影响研究》,载《才智》,2020年第5期。
- [57][70] 桂静文 朱立新:《亲子阅读活动对0-8岁儿童家庭亲子关系影响的实证研究》,载《教育观察》,2021年第10期。
- [58][71] 邓卓舒 琛等:《自然博物馆亲子教育活动中的对话内容研究》,载《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1年第5期。
- [59] 贾焱:《农村家庭亲子阅读中父母指导方式探究》,载《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8期。
- [62] Heckman, James J., JoraStixrud, Sergio Urzua.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6, (3).
- [64] 方超 黄斌:《非认知能力、家庭教育期望与子代学业成绩——基于CEPS追踪数据的经验分析》,载《全球教育展望》,2019年第1期。
- [66] Sobel, M. E..SomeNew Results on Indirect Effects and Their Standard Errors in Covariance Structural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6, (16).
- [67] MacKinnon D. P., Lockwood CM, Williams J. . Confidence Limits for The Indirect Effect: Distribution of The Product and Resampling Method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04, (1).
- [68] FornellClaes, David F. Larcker.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5).

(责任编辑:刘彦)